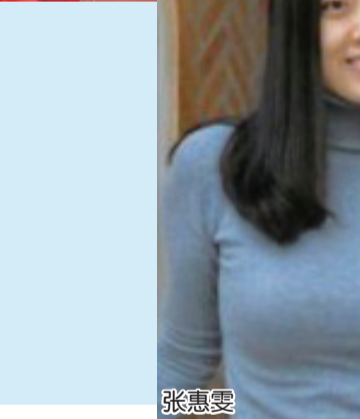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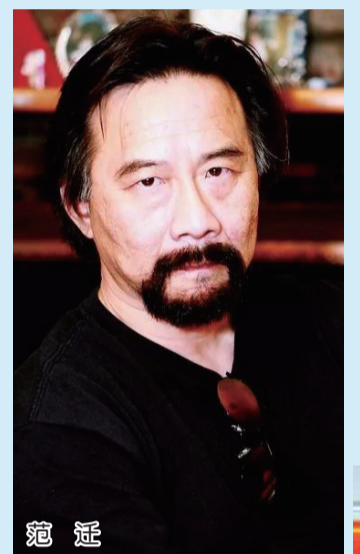


2017年海外华文小说:

情怀,小说之“眼”

戴瑶琴



小说之“眼”，是文本的最亮点，也是读者与作者以文学为媒介、心灵呼应共鸣的精确坐标。2017年海外华文小说的“眼”，我将其概括为“情怀”。如果仅从出版或发表数量上讲，2017年是一轮“小年”，但是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依然展示着当前的文学新意和未来的突破可能。

人·家国

“家国情怀”是海外华文文学绵延的主题，家国记忆、家国情感、家国使命的理念变化埋设于“落地生根”与“落叶归根”间的动态转徙。当前海外华文小说对“家国”的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时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同时，创作者对“家”的塑造主动规避了集体经验的叠加，格外专注于独立家庭的遭遇。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戴小华携纪实文学《忽如归》归来，为家人立传，讲述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真实经历。作品延续“家国情怀”主题的传统性表达，聚焦于家族信仰与民族大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之情也是其家族风骨。“我出生在台湾早期动荡的年代，亲身遭受到‘白色恐怖’历史悲剧的迫害，也耳濡目染过马来西亚社会的尔虞我诈，以及亲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就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岁月才让我从混沌到成熟，从无知到开窍，也让我认识了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命运的难测、生命的迷惑，因而逐渐塑造了现在的我。”持续的波动让作者深刻体悟“家”的信念传承，“要把羞辱转成荣誉，在万变中把握住该变的……因而在往后的岁月里，遇到任何挫折和人事的纷扰，我更加忍受，更加豁达，能够淡定而勇敢地面对一切”。离乡之痛与思乡之切源源不断地激发戴小华的文学责任感。“归”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回归，在“归途”中所有的付出与忍耐都让人收获了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飞跃。

日本华人作家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首先是稠密的地标式“中国故事”，福州的地域性格和文化特色烙在街巷、建筑、饮食、语言之中；其次是“小家”化，即以沈一义为中心，将与之相关的人物结构出一个泛义“家庭”，陈永和在创作谈里称作品为IDEA小说，“它的特别在于都有一个很强生命力的想法，整部小说就建构在其中，包括人物设计、情节走向、结构规划”。在《光禄坊三号》里，IDEA就是三份遗嘱。我认为IDEA更精确化的核心是“未知”，在这部作品中像是“协商”与“共谋”，它躲藏在“遗嘱”背后，

主导着困境的构建与开解。因为沈一义的遗嘱，与他相关的四个女人被聚拢到光禄坊三号。戏剧性迅速积聚到两个点，一是性格迥异的林芬（前妻）、冬梅（夫人）、龚心吕（恋人）、姜开放（崇拜者）即将开始的女人“暗战”；二是遗嘱的终极解密。但四条叙事线又扩散为若干网络，缠绕进子辈的爱恨情仇，思维导图式的构思虽缜密但稍显琐碎，难免重情节建设而轻人物塑造。

范迂的《锦瑟》进一步消解“家”，而只突显人。与近年众多跨越不同年代、惊心动魄或者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相比，这是一部“慢”节奏的小说。作者把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点缀于一个人的平凡生活。革命、爱情、人性等充满戏剧性的元素聚合在一起，并没有撑开一把剑拔弩张的弓，而是耐心下起一盘攻守有度的棋。作品最骇人的细节恐怕也只是处决犯人的一张照片。主人公“他”一生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叙述走进一条寻常不过的人生甬道，艾茉莉、阿香、瑛儿、恽姐、毕婵，渐次陪伴“他”经历“初起、冒进、迷惑、热情与挫折、获得与丧失”。人性的“恶”，都可以跟随时光蓬勃而起又黯然而熄。《锦瑟》的深意体现在“你所有的，只是你现时能感受到的一切，喜悦与悲伤，太阳与月光，同时交织成一体的人生。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不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也不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并不在生命之旅停留，无论意气风发还是困苦委顿，都只是“年华”的寻常遭际。我认为，“他”是一个方鸿渐式的知识分子，前进与后退都在被推搡中完成，得到和失去也是基于性格的顺理成章。故事立意源自李商隐《锦瑟》，命途多舛隐身于“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胸臆之中，“他”的人生要义被凝练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范迂着意饮食、建筑、围棋等“中国特色”的精致化书写，文化的典雅与行文的抒情相得益彰。

人·历史

历史是容量无穷的题材库。“与自然相反，历史充满着事件。在这里，意外事件的发生和无限不可能性之奇迹的出现是如此频繁，以至于说它们是奇迹都听上去有点怪异。但在这里，奇迹频繁发生的原因仅在于，历史过程是人类自发创造并时时打破的，就人是一个行动的存在而言，他是一个开端。”（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译林出版社）历史的“事件”与随之出现的“奇迹”，为文学制造着素材和想象，并由“人”的行动勾勒出完整脉络。“在最好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中，我们为自己意识到的真实所震动：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翻开下一页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真相大白，但当它出现后，我们意识到这也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们历来就了解的，不论是如何朦胧地了解的，经验的真相。”（[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芳华》和《劳燕》在2017年华文小说中热度最高，它们的共同点是作者改走一条历史的密道去追索真相。前者审视青春情怀以揭露人性的复杂，后者重构年代情怀以刻画女性的坚韧。

“芳华”时代，“爱浑身满心乱窜”，遭遇纯真时，它依然可以纯洁，也可以带着牵累。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四个文艺女兵各怀秘密，主题是刘峰与各自的关系。小说从人潮汹涌的王府井切入30年前的“红楼”，逐步解开刘峰“触摸事件”的真相。大家共同记忆里保存了两次“触摸”。一次是在刘峰向林丁丁坦承爱情的时候，正是她破口大喊的那一声“救命”，彻底扭转了刘峰的命运。另一次是他“拔刀相助”的托举，温暖并

救赎了何小曼。严歌苓将他审与自审推理出的真相进行对质，“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跟着一块活，一块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雷锋式”的刘峰反而被来自花季女孩们的精神暴力推下“神坛”，根本原因是“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互相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

《劳燕》积蓄着张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史料准备。创作初始，是由回忆录、剪报、照片，渐渐在作者眼前呈现出战争的另一个版本。《向北方》之后，张翎实施由“轻”（言情）到“重”（历史）的文学转型。《金山》的文史精耕，全面浮现她对历史叙事的新认知和新实践；《阵痛》和《流年物语》突破固有中西交错构架，展示出全新构造：从中国叙事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年代”，将其打磨成个人化的年代/人的私语、角力、悲剧美学。她在《劳燕》里更加主动地降低“言情”的语言温度，文本原先绵密婉约的古典美被淡化，而裸露出粗粝厚实的现实质地。小说转向对时真相的抽丝剥茧，揭开“中国战场”里“合作”状态下的中国平民与普通美国兵的“二战”经历。“交错”在《劳燕》里不被体现为中西方家族故事的交错，而是转化为人物塑造的一种方法。三个人（比利、伊恩、刘兆虎）、三重身份（斯塔拉、温德、阿燕）、三维时空（未来、现在、过去），揭示命运的交错与性格的交错，巧妙地配合《劳燕》中“三”的美学。阿燕又一次生动诠释了女性生命的韧性。无论怎样的密不透风的悲剧，她都能“用力踹出一个口子”，这股勇气和执行力也属于六指、美洛、小灯、吟春。就如程抱一在《游魂归来时》中的诗句：“孤苦女人一无所有却能恢复所有。潮涌下，旱地返春，一岸又一岸酣然开启。”

人·他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国故事”写作是海外华文小说的一项使命。白先勇《谪仙记》、严歌苓《少女小渔》、少君《人生自白》、陈河《沙捞越战事》、张惠雯《岁暮》、陈谦《无穷镜》都在不同时间段从不同的观审角度，叙述华人“在他乡”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接受。“但我已经不会像祖先那样，仰望明月高悬在马前或路旁，好听话给友人和故乡。我飘落到祖先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须活出另一种坚强。”《路线图》和《金尘》又写出了久违的“西方故事”的新意。

王荒的语言果敢潇洒，小说集《路线图》展现都市人对生活多样态的理解。“为了维克托”就是父亲邱振峰的动力和借口。事业的挫折、家庭的危机，已是坚硬的真相，但所有的冰冷和恶念却被雪夜突然降临的“圣诞老人”劈开了。桑德斯与邱振峰有着相似的境遇，可他以“圣诞老人”的爱心和童心，真正地拯救了濒临被抛弃的维克托，同时唤醒了邱振峰的善意与真情。《路线图》里的安泊，每一次选择都先精心设计出“路线图”，分析利弊、安排进度、权衡得失，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顺利地成为“加拿大人”。然而，安泊与爱莉丝的母女情一次次制造了路线的拐点，理性终究让渡于感性，投机败于亲情。

曾晓文《金尘》的开场是“女蛇头”青姐的隆重出殡，“造孽者”受到众多“偷渡客”的礼遇，是对通识观念的公然挑战，“悬念”就已调动了阅读的兴趣。“偷渡”是华文文学很少出现的题材，若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饱含充沛的兴奋点。作者对偷渡事件是一种常识性描写，但却耐心地分述由“偷渡”而扭曲的各色人生。小说很精彩的

落点是尖锐地指出人“逐利”的共性。陶晋抛弃了丈夫，金西背叛了法律，焯焯搁置了艺术，阿芸自愿冒着巨大风险“黑”进美国，青姐十年如一日地坦荡经营“带血”的事业。我觉得，曾晓文以长篇的篇幅暂时完成了中篇的创作，而这个题材能激发许多社会问题的暴露，很值得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人·自我

黎紫书的《余生》是一部直人性莫测的微型小说集。我特别喜欢《余生》设计的反差，“尽管医生三番两次预告老余快要不行，他却惊人地活了很久很久”。吊诡源于老余顽劣般的“求生”。因为“他每次看见那个年轻的自己在梦中走过，就竭尽全力睁开眼睛，希望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正在某个赶着上班的清晨中，而不是在一个淤积了许多旧时光的笼子里。”《错位》里模范生“他”诚然已遭遇了车祸，而其盘桓内心的“自我”为了不辜负母亲的寄望，不得不附着于逃学的陈小光，继而仪式性地赶赴年终考试。“他占据了陈小光的身体，就像妈妈占据了了他的生命一样吗？”“自我”是无所依傍的，它始终被动处于“错位”状态。每一则故事忽闪着主人公对待世界的狡黠，他们极力封锁不想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保持冷静地理解生活、透彻地了解人，黎紫书采用理性处理方法，尽量地留白，创造思想的回旋，然而人物越陷深思，生命就越发苦涩。黎紫书洞悉被掩藏的一个自我，却秘而不宣，她始终还是相信人的心底都有一份恒久不变的真善美。

张惠雯的两部小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美国“南方故事”，但都坚守现代人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的保护。我甚至想，《我梦中的夏天》里，“我”在寻找汉森农场时遇到的像从《断背山》里走出来的中年男人，是不是成为了《暮色温柔》的原型？《我梦中的夏天》依托回忆营造出一种今昔对比的叙事效果。过去相对来说充盈着“美”，连忧伤都是充满诗意的温暖，而如今则是规则化的、程式化的，在平静中暗涌着对生活的绝望。《暮色温柔》中的“回乡”旅途上，戴维想倾听雅各布与亲人“十五年”隔绝的真相，雅各布想确认他的“出走”原因是否至今仍是故乡收藏的秘密。小说体现出非常规范的欧美小说叙事节奏，张惠雯透露在创作时曾有意识地先用英文叙述一遍再转化为中文，但作品依然保持抒情的绵密纹理。“那是一条南方的乡村土路，路边的风景是荒草、灌木和稀疏的农庄，突然中断的、长满荒草的灌溉渠，以及从灌木丛后一闪而过的、浑浊的无名河流。戴维想，那完全不像一个现代的故事，但它似乎又和这里的孤独、荒凉相得益彰。”西方土路、荒草、灌木、农庄、河流，一组“寒”和“瘦”的意象，铺就成萧瑟凄清的，归属于美国南方乡村“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铺展开由同性恋、恐惧、谎言、出走、自杀等矛盾元素组合而成的中（戴维）美（雅各布）故事。

2017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科幻热”，年轻华裔作家的科幻小说被集中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或再版，如特德·姜的《降临》、刘宇昆的《爱的算法 杀敌算法》《奇点移民》、鲍嘉璐的《月球人》、陈致宇的《特工袋鼠》。科幻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在文学与科学的对话、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文学与世界的对话，相当数量的“70后”、“80后”、“90后”华裔作家拥有深邃的“宇宙情怀”。以此推论海外华人文学，年轻作家需要持续地发现，而不同类型的小说需要及时的关注。

大龄女青年的情人节日记

——评周洁茹新作《记没有意义的一天》 □山 尹

《记没有意义的一天》收录于周洁茹的中短篇小说集《罗拉的自行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1月），小说采用女性漫游方式组织材料，语言在“我”的行动和心理层面自由移动，着力表现“我”的直觉和情绪，几乎没有概述和分析性的句子，整个作品情感饱满，人物形象鲜明，文体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但却没有囿于性别，而是从个别走向了一般，是一篇生动精致的作品。

《记没有意义的一天》几乎囊括了都市文学所有的主题。香港大龄海归女在情人节这一天乘车去北角会友，地铁上，被迫聚集在狭小空间的人们不自觉地尽量互相疏离，“每个人都使劲拽着自己的脖子”，简短的一句话，写尽了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发达都市中繁华的荒凉。“不高兴”的“我”一路冷眼论人：“一定是一个天秤座”，“一定是一个金牛座而且A型血”；操上海口音普通话的小巴司机的沉默与粗野的行车方式，则暗示出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中多元文化共存带来的不同人群潜在的冲突——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防卫心理，身处异地的他必然遭遇过文化冲击甚至歧视，但他的行为则无疑构成了对弱势性别的一种暴力。

国际大都市常常根据多元文化共存理念，对空间做意图明确的规划，这种规划为生活带来了便利，给个体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选择并不等于自由，它同时还是资本对欲望、消费的规划，对于孤独自闭带有自毁倾向的女主人公而言，它刺激了欲望，让她在两极间摇摆，选择成了另一种形式

的奴役：“楼下有一排四家馆子”，“我”要么一家店也不想吃，要么每家店都想吃。“我”不高兴是因为情人节要被放单，这个隐秘的痛苦让“我”心情烦躁，语多讥诮。格蕾丝把“我”叫去，和“我”分享自己婚外情的节日礼物，她的“甜蜜”和“我”的苦涩、凄凉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不动声色中，周洁茹把大龄高知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物性格与才德剥离开来：女性和人是不相同，但是面对的处境却没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个善良、独立甚至还有点清高的人，工作才能出众，但这一切和“我”的命运、处境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通常，分析小说中谁在说话、对谁说、说什么、用什么方式说能够让我们发现叙述深层的动力。而在被言说的东西背后，则隐藏着主体、主体的系统、潜在的能量和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等等信息。《记没有意义的一天》是大龄女青年的情人节日记，叙述由情人节前夜开始，结束于情人节之夜的满月，中间“我”因目睹餐厅大量预订的节日盛况，想起了自己大年夜独自吃饭的情形，超市采购则激起了“我”对台风夜超市情形的回忆。这两段闪回都选得精妙，前者是一个既有文化系统为个体提供的融入社会的契

机，后者是自然地理为个体提供的融入契机，再加上情人节这一当代资本大力开发的娱乐节日，都指向了人的社会性本能，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渴望。然而，“我”却总是孤单一人，“我”成长与生活的复杂文化与时空背景——从中国到美国又回到中国的经验，塑造了思维独立、工作能干的“我”，却造成了“我”与社会的疏离。周洁茹为物所设定的这个背景，显示出了时空强大的塑形能力。人从来都不是自由的，他们被时空所生产、影响和限定，只能徒劳地挣扎。这绝不是哪个个体的心理问题，它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都市文化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

在《记没有意义的一天》里，周洁茹把节日、娱乐、地理时空综合起来，呈现了一个渴望被关爱却只能自闭自残的女性，她把所有刻薄的话都留在心里，只向外发出爱的信息，却得不到有效的回馈，她和社会只建立了最表层的医患联系，还是通过自我身体而获得的。尽管她在情人节前的烦躁都是当代消费文化诱发的，然而对爱的渴求却基于人性的本能，她在日记里虚构了一个“你”作为谈话对象，还故意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读来让人有种难言的心酸。



任伯年所绘《花鸟四帧》之一

华馨 唐達成書 HUA XIN